

马东瑶 著

苏门六君子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苏门六君子研究

马东瑶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门六君子研究/马东瑶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
ISBN 7-301-08799-3

I. 苏… II. 马… III. ①文学家—人物研究—中国—北宋
②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北宋 IV. ①K825.6②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9420 号

书 名: 苏门六君子研究

著作责任者: 马东瑶 著

责任编辑: 谭 艳

标准书号: ISBN 7-301-08799-3/I·072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邮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5

排版者: 华伦图文制作中心

印刷者: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毫米×1240毫米 A5 7.625印张 219千字

2005年3月第1版 2005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6.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序

张 鸣

马东瑶君的著作《苏门六君子研究》即将出版,她来找我写一篇序,于情于理,我都不应推辞。

所谓“苏门六君子”,指的是苏轼门下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陈师道、李廌等六人。他们在北宋文坛上都是声名卓著的人物,北宋元祐前后的文学发展高潮,与这几位才俊之士的创作贡献有相当大的关系。在文学史研究的领域,这六人中的大多数一直受到学者的关注,相关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但从“文人群体”或“文人集团”的视角对这六人做综合性深入考察的论著却还不多见,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揭示。

提到“苏门六君子”,自然而然就会想到文学史上经常提到的所谓“苏门四学士”的说法,表面上看,“六君子”只是在“四学士”的基础上增加了陈师道和李廌二人而已。可是,“四学士”的称谓是由这四人都曾在馆阁任职的客观身份而来,而“六君子”的说法则不这么简单。那么,“六君子”这一带有道德评价色彩的提法到底是怎么来的?它的道德评价因素又隐含了什么样的历史动机?何以苏轼门下众多门生中被称为“六君子”的是这六个人而不是其他?这些问题看似简单,但要认真解答起来其实并不容易。而这恰恰是从文人集团视角研究“苏门六君子”首先必须解答的问题。这部著作论述的内容,正是从以上这些基本问题入手的。

本书原是马东瑶君的博士学位论文。记得在确定选题时,她征求我的意见,我曾因有感于古代文学专业博士论文选题存在的一些问题谈过一些想法,给她提出过一些建议,主要有两条:一是在文学史立场上确定研究对象,但视野和思路不能拘泥于文学本

身,应尽量打通文史界限,从文化史、思想史背景考虑问题。二是不能只确定研究对象,而应在广泛阅读积累思考的基础上提出问题,为解决问题而确定题目。问题意识不明确,哪怕自己已有充分积累的研究对象都宁可舍弃。不要写那种有对象无问题的论文。马东瑶君有相当好的学术悟性和根基,她也赞同我的这些意见,在后来的研读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思路和格局,考虑了自己的学术积累、兴趣和才情等因素,最终把论文题目确定为《苏门六君子研究》。初看这这也是一个有对象无问题的论题,但实际上,问题正隐含在“六君子”的称谓中。这里的“六君子”概念,已经隐含了对这六人的道德性历史评价真相的揭示,深入下去,更多复杂而有意味的问题也随之显现。搞清“六君子”称谓的来历、含义以及逐步定型、传播乃至典范化的过程,实际上涉及宋代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许多问题。可以说,“六君子”称谓是一个切入点,论文主要解决的问题却不限于“六君子”本身。马东瑶君是尝试从文化史、思想史与文学史的关系上来处理这个题目,并非平面地讨论“六君子”的文学成就,这就决定了研究的宏通视野。在这样的视野中,书中关于“六君子”集中到苏轼门下的动机和过程的考察,关于苏轼和“六君子”师生间对对方评价的梳理,关于“六君子”思想言行品德操守以及文学活动的形态特点的分析,关于“六君子”成为文人典范的演变过程的考索,等等,都获得了新的阐释角度,许多论述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其一,“六君子”的创作中,存在大量的唱和之作,历来的文学研究,多把唱和诗看作应酬文学,评价不高。本书则另辟视角,把唱酬看作文人集团内部重要的活动方式,从“诗意”的交流和“诗艺”的切磋两个层面看待六君子的诗歌唱和和活动,探讨了“六君子”文学创作与“文人集团”的行为方式之间存在的互动关系,进一步揭示了“六君子”唱和活动对北宋后期诗歌艺术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唱和”的文学活动形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唱和诗的功能和类型特点。如果不考虑文学活动形态的特点,也就不能真正从正面认识唱和诗的价值所在。因此,本书从考察“六君子”唱和活动形态入手,阐释其唱和诗功能和类型特点的思路,较好地揭

示了事情的意义。这对重新认识宋代大量存在的唱酬文学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其二,宋代思想学术对文学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本书特别从学术论争的角度切入,考察“六君子”思想学术立场和人生观、道德观,进一步讨论了“六君子”文学与其思想学术的关系。作者认为,“六君子”普遍崇尚“平淡”的审美境界,追求“平淡”的文学风格,这是他们的人格理想在文学创作中的体现,而这种人格理想又是由他们的思想学术观念决定的。这样的论述,避免了平面的简单的风格分析,较深入地揭示了文学风格追求与思想学术之间的微妙关系。

其三,如前所说,“六君子”称谓的来历和传播,存在许多有待揭示的问题。马东瑶君在这方面下了较大的功夫,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考察北宋后期到南宋的政治环境和思想学术论争的演变,着力于揭示“苏门六君子”称谓出现及流行的过程和原因。可以说,本书关于“苏门六君子”称谓产生时代的考辨,关于“苏门六君子”与“苏门四学士”称谓的差异以及差异背后所隐含的文化历史意义等问题的论析,都体现了相当好的学术功力,不仅钩稽了丰富翔实的史料,澄清了一些模糊的认识,而且揭示了与“六君子”接受与传播相关的文学史建构的动态过程和复杂的思想文化动机,其思路 and 见解都有启发性。

其四,马东瑶君还注意到“六君子”实际上还被历代文人视为文士的典范,在后人心目中,他们的为人品德节操和文学创作都具有典范意义,这种典范性的认识实际上又成为文学史建构动态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维度。可以说,无论从文学研究的角度还是从文人集团研究的角度,考察“苏门六君子”的典范性及典范化过程,都是一个新颖而有理论价值的思路。贯彻这一思路,马东瑶全面考察了“苏门六君子”成为文人典范的内在根据,并结合南宋以后思想、政治、学术、文化发展变化的背景考察,揭示了“六君子”在历史上的典范化过程及原因。实际上,自南宋初“苏门六君子”称谓出现,就意味着这六人作为一个群体成为士人典范的过程已经开始发端,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这六人的品德节操和文学成就都

受到历代文士的高度评价,而且道德评价的因素越来越被强化。这种典范化的历史过程,实际上又蕴含着思想、政治、学术发展变化的复杂因素。因此,“六君子”之成为士人典范,既由这六人的品德节操、文学成就所决定,又是由后人在接受解读中共同塑造的。这些论述,从新的角度解释了“苏门六君子”在历史上的特殊意义,也为思考文学史建构历程中的典范性问题提供了一个示范。

总之,本书因着重于论述问题,在选择的几个问题点上都有深入的开掘,并富有创获,避免了教科书式面面俱到的平面叙述,体现了良好的学术意识,也显示了驾驭、解决较复杂学术问题的能力。当然,选择了这样的论述思路,也就决定了全书的格局。而关于“苏门六君子”文学成就方面的论析,没有正面铺开,这大概是为了突出论述的问题而有所舍弃吧。在我看来,这样的舍弃,有利有弊。利,已如上述,弊,则在于对“六君子”的文学成就若谈得不充分、不全面,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对他们的文学史贡献的认识,也不利于典范性问题论述的深入。实际上,据我了解,马东瑶君对文学有敏锐的感悟力,在文学文本分析方面也有灵气,而采取现在的策略,不把对文学文本的全面讨论作为重点,并非不能,而是有所不为。若从理想的角度看,加强对“六君子”文学成就的论析,则本书阐述的问题将会得到更好的处理。既然马东瑶君有文学感悟和分析的长处,不在论述中充分发挥,毕竟是有有点可惜的。

由于论题本身的性质,马东瑶君为自己的研究确定了以问题带动材料、文献考证与文化解读相结合的大思路,我认为这是有利于实实在在阐释问题的思路,因此十分赞成。她并进一步提出采取还原历史情境、追索事件过程、解读文化原因的方法,去考察、论述相关问题,这一想法是我们在平时的讨论中逐步明确起来的。我认为这是非常理想的研究文学史问题的方法,本书的尝试使用,相当成功,有的地方虽然还受史料的限制,不够到位,但方法上的探索无论如何应当肯定。

马东瑶君在北大中文系学习,从本科学士学位论文到硕士学位论文,都是由我指导的,因接触的时间较长,我对她的为人和才情有较多的了解。她有很好的文学感悟力,对学术研究也有兴趣,

好学深思,勤奋努力。从大学本科到硕士毕业,进步十分明显。记得她的本科毕业论文虽显示了学术上的发展潜质,水准也在一般之上,但并不十分出色。而经过三年研究生的刻苦攻读,硕士学位论文就写得相当好,硕士论文已分为几篇在《文学遗产》、《杜甫研究学刊》等杂志发表。1999年她硕士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上北大中文系博士研究生,导师是周强教授。因她的研究方向是宋代文学,周强教授委托我代为指导。马东瑶君有很好的学术意识和自觉,博士论文从选题到研究思路、方法,以及论述框架的决定,都是她独立完成的。我除了提出一些原则性建议之外,并未过多干预,只是为她敲敲边鼓而已。当然,我们在一起讨论问题,总是互相有所启发,因此也是十分愉快而值得回忆的经历。她的博士论文受到答辩委员的好评,但她在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意识到自己的史学训练还更应加强,因此在获得文学博士学位之后又申请到北大历史系邓小南教授门下做博士后研究,两年后又完成了二十来万字的出站报告《文化视域中的北宋熙丰诗坛》,在打通文史的学术训练方面又有了新的进展。据我所知,她还有关于“元祐诗坛”的研究课题,已做了相当充实的准备。这些训练和成果都为她的学术格局的形成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我希望她继续保持学术研究的兴趣和毅力,趁着年轻,抓紧读书治学,勇猛精进,以期大成。

2005年2月6日

于京西博雅西园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苏门文人集团中的六君子	(11)
第一节 文学之交	(11)
第二节 唱酬之盛	(28)
一 诗意的沟通方式	(29)
二 诗艺的沟通方式	(44)
第三节 困境中的慰藉	(59)
第二章 苏轼眼中的六君子与六君子眼中的苏轼	(72)
第一节 苏轼眼中的六君子	(72)
一 斯文之美	(73)
二 君子之德	(80)
第二节 六君子眼中的苏轼	(88)
一 “临大节而不可夺”	(88)
二 “东坡文章妙天下”	(99)
第三章 儒学转型时期的苏门六君子	(110)
第一节 六君子眼中的“道”	(110)
第二节 文学中的儒家之“道”	(122)
第三节 文学中的苏门之“道”	(139)
第四章 “苏门六君子”的典范化	(157)
第一节 “最爱元祐”	(157)

第二节	理学崇黜与“苏门六君子”的典范化	(160)
第三节	“君子”、“小人”之辨与“苏门六君子”的 典范化	(169)
一	北宋的“君子”、“小人”之辨	(170)
二	南宋士风与“苏门六君子”的典范化	(179)
第四节	后人眼中的苏门六君子	(188)
结 语		(204)
附 录	苏门六君子交游年表	(206)
参考书目		(220)
参考论文		(229)
后 记		(231)

绪 论

苏门六君子,指的是苏轼的六个弟子:黄庭坚、秦观、陈师道、晁补之、张耒、李廌。他们以其突出的文学成就而成为苏轼的得意门徒,从而被研究者视为苏门骨干。王水照先生对苏轼及苏门文人用力甚多,论文《“苏门”的形成与人才网络的特点》、《“苏门”的性质与特征》、《“苏门”诸公贬谪心态的缩影——论秦观〈千秋岁〉及苏轼等和韵词》、《论“苏门”的词评和词作》等对以“四学士”、“六君子”为主要对象的“苏门”从不同角度进行论述,精见迭出,体现了苏轼及北宋元祐文坛这一学术领域的最前沿的研究成果。但是我发现王先生论文中屡次提到的作为“苏门”骨干的“四学士”、“六君子”之名颇有令人不解处。众所周知,“四学士”的称号来自于元祐年间黄、秦、晁、张同任馆职,并且这一称呼在当时便已广为人知;而让人疑惑的是,“六君子”之名又从何而来?这引发了我最初的兴趣,而对于相关资料的搜检、积累促使我最终选择了“苏门六君子”作为研究对象。因为我发现这一称号的出现不仅与文学有关,同时也与从北宋中期直至南宋的思想、政治、学术、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故而是一个极有学术价值的课题。

今人对这一称号的认知,多来源于南宋初年传为陈亮所辑的《苏门六君子文粹》,我在开始寻找这一称号的起源时,也是从这部书入手的。但是这部文粹没有留下任何编纂者的序跋,这使我们想从中获得关于“苏门六君子”线索的企图宣告破灭。那么只能退而求其次,看看南宋以后的人是如何理解这一称呼的。钱谦益在万历重刻本《苏门六君子文粹》序中说:“史称黄、张、晁、秦俱游于苏门,天下称为四学士。而此益以陈、李。盖履常元祐初以文忠荐起官,晚欲参诸弟子间;方叔少而求知,事师之勤渠,生死不

间,其系于苏门宜也。”^①他认为苏门六君子是在“四学士”的基础上加了陈师道和李廌。但其中的问题是:陈师道虽然因文忠之荐而起官,但他并非为苏轼所推荐的惟一一人,为何单单只有他列入六君子?而且序中所说的“诸弟子”意思含混,不一定是指四学士。事实上,被认为是苏门弟子的远不止六人之数,且其中不乏文才杰出之士。那么后山又是如何被忽略掉了曾为曾巩门下的事实而从诸弟子中脱颖而出成为“六君子”之一的?我以为从钱氏对方叔“生死不间”的评价入手可能更说明问题。钱谦益接下来在序中又说:“当是时,天下之学,尽趋金陵,所谓黄茅白苇,斥卤弥望者。六君子者,以雄俊出群之才,连鑣于眉山之门,奋笔而与之为异。而履常者,心非王氏之学,熙宁中,遂绝意进取,可谓特立不惧者矣。方党论之再炽也,自方叔外,五君子皆坐党,履常坐越境出见,文潜坐举哀行服,牵连贬谪。其系排苏门之学,可谓至矣。至于今,文忠与六君子之文,如江河之行地。而依附金陵之徒,所谓黄茅白苇者,果安在哉?”按照中国传统的知人论世观念,作家之“文”常常被与“人”和“世”联系起来。钱氏贬王门而褒苏门是南宋以后否定王安石变法及其新党的普遍态度的体现。但值得我们关注的是,钱氏在此处是将“六君子”作为一个具有相同节操的整体来加以颂扬。联系从孔孟以来对“君子”之义的界定,我们显然只有暂时跳出文学的狭窄范围,将苏门六君子放在文化的大视野中,才有可能从进一步的研究中寻求到问题的答案并获得有学术价值的成果。

一切艺术的演变与发展都离不开它所生长的文化环境,对于研究苏门六君子的文学来说,文化学的思维方式尤其重要。因为我们首先需要了解苏门六君子是如何作为一个集体得以存在于当时及以后的文化环境中,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探讨他们的文学。所以本课题的出发点是文学,最后的落脚点也仍然是文学,而文化的研究则是这段文学之旅中极为关键的一个环节。对于本课题来说,它甚至和文学一样重要,否则后者必将成为无根之木、无水

^①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二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之萍。

在形成苏门六君子的文化环境中,政治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它并不是仅仅作为六君子进行文学活动的背景存在,而是与“苏门六君子”称号的形成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对于中国的文人来说,与政治有联系不足为奇,而宋代“以士大夫治天下”的国策则使文人与政治的关系空前密切,在主观上它激发了文人参政的热情,客观上则往往使文人陷于党争之中无法自拔。苏门六君子正是生活在新旧党争、元祐党争、崇宁党祸这样一个与党争相始终的时代之中。这对于六君子的仕途来说,显然不是施展政治抱负的好时机;而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比起战火纷飞的年代来说,北宋的中后期其实还算得上是太平盛世,但党争的朝局对于文人个人命运的影响却几乎不亚于战乱。所谓“诗家幸”,是说如果六君子能够有展现政治抱负的平坦仕途。他们的文学却一定会贫乏很多,我们将无法感受他们在艰难贬谪生涯中的矛盾、痛苦、挣扎,困境中的复杂心路历程以及相互间令人感动的关怀与真挚情谊。而要研究这些创作中的精彩之笔,显然不能局限于他们的文学本身,尽管文本所体现的纯文学的问题同样也是我们关注的部分。

党争对于六君子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在文化的意义上,具体来说就是“苏门六君子”的称号实际上是随着党争而产生并典范化的。所谓“典范化”,是指“苏门六君子”成为士人典范的过程,它分为六君子“在场”的北宋时期和六君子“不在场”的南宋时期。通过追索这一过程,我们得以重新考察贯穿北宋始终的“君子”、“小人”之辨,并解读六君子何以被南宋人树为典范。我在研究这个课题的过程中,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搜检,已经确知“苏门六君子”的称号最早并不是来自《苏门六君子文粹》,^①《文粹》的编纂者只是使用了一个在当时已经广为人知的称呼而已。正如六君子中大部分人的文集在崇宁年间被诏毁是当时旧党在政治斗争中彻底失败的结果,南宋出现大量以“六君子”命名的文集显然也与当时的政治取向有关,与靖康之难后南宋王朝对北宋党争的反思有

① 详见第四章第三节第二小节《南宋士风与苏门六君子的典范化》。

关。还原和解读南宋的这一段历史,对于了解“苏门六君子”称号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环节之一。

对于两宋学术思想相关问题的考索则是探讨“苏门六君子”称号形成的另一重要环节。如前所述,“君子”之名由于孔孟等人的阐释已经成为一种承载着儒家道德理想的指称,而“六君子”的称号是由后人赋予,所以考察六君子本人对儒家思想的态度关系到这一称号是否名实相符。我们知道,北宋的新儒学经过“宋初三先生”(孙复、胡瑗、石介)、张载、周敦颐等人的不断完善,到元祐时期正渐趋成熟。儒学在中国已历千年,而在北宋中期终于有了一次大转型。以二程为代表的洛学是后来成为官方正学的理学的前身,也是这次转型的主要力量,它的儒学继承者的正统地位无论是二程自己还是后人都不曾表示怀疑。那么,以苏轼与六君子为代表的蜀学作为北宋时期最大学术论争的洛蜀之争中的另一派,与儒学又是何关系?包弼德(Peter K. Bol)先生的《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①一书在评述中国11世纪中期的思想潮流时,用了“思想家,其次是作家”的题目。他是以欧阳修和他的同时代人为例来阐明这一观点。让人关注的是,作为欧阳修弟子的苏轼及再传弟子的六君子又如何看待“道”及其与“文”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洛蜀之争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学术论争,它与六君子的文学和政治都有深刻关系。对于前者来说,其关系不仅在于学术精神的渗透对文学所造成的影响,还促使我们从学术思想的角度去重新审视某些文学现象。例如六君子对于“平淡”的追求,如果单从学习以陶渊明为典范的诗歌传统的角度去考虑的话,可能只会流于表面,也无法深入理解从宋初到梅尧臣再到苏轼与六君子的“平淡”诗风的流变关系;又如大量存在于六君子“文”中的戏谑之语和侧艳之辞,过去人们常常将之视为文人的游戏笔墨之作,这同样只揭示了一种表象。如果我们从洛蜀之争中去考察两种学派对于“道”的理解的同与异,对于六君子的这些文学现象将会有更深入的体察。至于洛蜀之争与六君子的政治的关系,不仅体现于元祐

^① 刘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时期由学术之争而引发的党派之争对于六君子政治命运的影响,也体现于南宋时期理学崇黜对于六君子典范化的影响。我们知道,南宋时期是理学经过曲折发展而终于成为官方正学的时期,蜀学则随着苏轼与六君子的去世逐渐衰落,在这样一个两种学术力量对比悬殊的时期,“苏门六君子”反而获得了它的典范化地位,这与理学获得统治阶级认可之前,参与政治而浮沉不定的政治命运有关,也与理学家对蜀学与六君子观念的改变有关。追索这一过程,是我们探讨苏门六君子如何在南宋典范化的另一重要环节。

对于六君子的典范化来说,政治与学术是由他们亲自参与其中的北宋而又延续至南宋的两个因素,至于南宋及以后他们被进一步“塑造”成完美典范,则体现了大众对他们“接受”与“阐释”的再创作过程。正如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对于他所关注的对象都有其个性化阐释,但在大致相同的背景下,这种阐释也会具有一定的共性。例如我们在相同的时代、相同的意识形态以及占有相同史料的前提下,对于屈原、秦桧、文天祥等都会有大致相同的评价;而如果这种阐释出现集体性的转变,那么一定是某种前提或背景发生了变化或是出现了某种新的因素。例如六君子中的秦观,他的同时代人从其诗词作品中读出了贬谪带给他的无限愁苦,南宋人面对同样的作品读出的却是他贬谪不忘忧国的节操与乐观豁达的性情。这种差异明显的阐释引发了我们对于两个问题的思考:其一,从史料来看,北宋人对秦观的评价更接近于他的本来面貌,那么,南宋人所树立的“六君子”的典范形象是否是一个背离历史真实的“伪命题”?如果是,为何南宋以后的元、明、清人都接受了这一看法?其二,作为在“苏门六君子”的典范化过程中主观性最强的一个因素,促使南宋人做出这种阐释的原因何在?它与南宋人因为靖康之难而对士风的反思是否存在某种联系?

不管怎样,南宋人对“六君子”的推崇所造成的一个客观结果是有利于后者文学作品的传播与保存。如前所述,由于古代文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以及舆论对于人品操守的看重,文人作品的存佚情况往往受此影响。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新党作家群文学作品

的大量亡佚;而六君子在南宋典范形象的确立使人们乐于传播与保存其作品,这为我们现在能较为全面地研究其创作提供了条件。虽然我认为对“苏门六君子”的研究必须将其放在文化学的大视野中,并且认为文学归根到底其实也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作为一部文学论稿,我还是以示强调地在第一章便对六君子的文学加以探讨,同时也是希望读者先从文学的角度去了解和感受苏门六君子,因为这符合他们在本质上的文人身份与特征。从个体来说,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凭借自己独特的文学风格,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作为一个集合体,他们的普遍特征与“苏门文人集团”这样一个概念紧密相连。“苏门”是一个在文学史上由来已久的称呼,宋人吴曾说:“人才各有所长,虽苏门不能兼全也。”^①指的是黄、陈、秦、张、晁等人。明胡应麟说:“宋世人才之盛,亡出庆历、熙宁间,大都尽入欧、苏、王三氏门下。”^②此处的苏门一共包括了二十三人;全祖望增补《宋元学案》在《苏氏蜀学略》之“东坡门人”下则共列入了十一人。今天的研究者谈到“苏门”时,除了“四学士”、“六君子”等固定称呼,对于“苏门”的人数大多众说纷纭,而对于“苏门”的性质也是各执一词。王水照先生说:“‘苏门’是以交往为联结纽带的松散的文人群体。它经历了先由个别交游到‘元祐更化’时期聚集于苏轼门下的自然发展过程,形成以苏轼为核心,‘四学士’、‘六君子’为骨干的不同层次的人才结构网络。”^③此前程千帆先生在《两宋文学史》中亦以“苏轼影响下的作家群”为题来讨论“苏门”文人。我以为,将“苏门”判定为文人群体并无不妥。由于苏轼乐于奖掖后进,游于其门者甚多,使苏门成为一个开放的、松散的群体——这也正是研究者对其人数无法确定的原因。但是,就六君子与苏轼的关系而言,我认为他们更符合

①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一,中华书局,1960年。

② 胡应麟《诗薮》“杂编”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③ 王水照《论“苏门”的词评和词作》,《苏轼研究》第227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作为一个“文人集团”而不是“松散的文人群体”的特征^①——而他们之所以形成苏门文人集团的原因,正是本书第二章所要探讨的问题。对于苏轼与六君子来说,这是他们之间互相吸引、互相选择的结果,虽然文学是他们形成集团的根本,但并不是惟一的决定因素。追索他们最初结交的过程,解读他们互相选择的原因,我们才能了解苏门文人集团的独特意义。另外,这一章的意义还在于,作为文人的六君子,实际上是联系我们所探讨的文学与文化的纽带。

让我们再回到第一章。既然六君子属于文人集团,而文人集团最为突出的特点在于“交游”,那么我以为从交游的角度来考察六君子之文是一个合适的切入点。我们知道,宋诗的很多基本精神与特点都是在庆历诗坛初步形成,而成熟与确立于元祐诗坛。按照文学的一般发展规律,往往是先有艺术实践,后有理论总结,再在此基础上将创作推向成熟。如果说庆历时期是体现宋诗基本精神与特点的创作实践期,元祐时期则因在自觉的理论总结的基础上继续将诗歌创作推向成熟而成为宋诗发展的最高峰。作为元祐诗坛的主力,苏轼与六君子正是通过“交流”而体现出理论总结的自觉性与诗歌创作上有意识地互相推动,并且这种自觉意识普遍地存在于对诗、词、文以及文体本色论等问题的相互沟通与探讨中。对于六君子的文学实践,我选择了唱酬之作这样一种最典型

① 郭英德先生在《中国古代文人集团论纲》(《中国文化研究》1996年第2期)中指出,文人集团是一种文化职能集团,它是由知识阶层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为了一定的目的组织起来进行文化活动的社会团体。文人集团的主要活动领域是精神文化领域,但由于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的密不可分,因而和西方的文人集团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职能集团而存在与活动不同,中国古代的文人集团往往兼具政治的和文化的双重功能,同时在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中纵横驰骋。郭文认为中国古代的文人集团起源于先秦时期,并把数千年来的文人集团分为了学术派别、文学侍从、政治朋党、文人社团和文学流派等几种不同类型。我以为,这一划分法自有其道理,但在另一方面,正如郭文所说,中国古代的文化与政治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而即使是所谓纯粹文学性的文人集团如建安七子、竹林七贤、竟陵八友等,无不跟政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本课题所讨论的苏门文人集团更是如此,而这正是将其与松散的文人群体区别开来的重要特征之一。